

## 白皮红心的海洲政权<sup>①</sup>

讲述者

袁世根（1912—1951），中山海洲乡人。1927年入读县立乡村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参与抗日宣传。师范毕业后，先后在古镇、鹤山教书，1935年任海洲小学教务主任。“七七事变”后，任海洲乡副乡长。中山沦陷后，辗转到罗定县任民众教育馆馆长兼《罗定日报》主编，利用此阵地宣传抗日救亡。1941年，任海洲乡乡长兼海洲小学校长。1944年5月，参与建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抗日民主同盟”，创办《持正报》。同年10月，协助中区纵队主力经海洲挺进粤中，后被中区特委吸收为共产党员。1946年夏，任邦平乡乡长，暗中为党和抗战工作发挥更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三区区长。1951年被错杀，1981年平反，恢复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的政治名誉。



袁世根

### 鱼龙混杂 是非之地

海洲位于中山、顺德、新会县的边缘，北面隔一条小河是顺德江尾，西面隔一条大河是新会荷塘。江尾的太平墟，过河是横江，荷塘的塔江过河是周郡，横江、周郡可以直通鹤山沙坪。海洲自从谢云龙将合成堂的土匪消灭后，地方秩序逐渐安定，成为沦陷区运货到内地的枢纽，以及民利公司和“挺三”司令部联络的交通站。许多乡民凭借地理优势以很少的本

<sup>①</sup> 摘自《袁世根自传》，原载《海洲忠魂》，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98年。略有改动，本文标题与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钱或者根本没有钱就和其他走私者以对等的地位合股组织运货公司或走私。规模最大的便是以屈仁则<sup>①</sup>、谢云龙为首，海洲袁锦辉为代理人的仁龙公司。他们从港澳走棉纱、汽油、食盐到内地，在内地运烟叶、子弹、枪支回沦陷区。民利公司各个支队均有人在此居住，一支队、四支队有王生；三支队有朱大和、罗少伟；二支队有“烧猪金”本人及其特务中队长梁庆中；民生公司的老板潘友玲的家眷也居住于此。属于张惠长系统的有孙恩荣，后来张惠长本人也在这里居住过一年半载，属于特务组织的黎越挺和张民生凭借莫予京的关系也到这里居住。“大天二”<sup>②</sup>中经常来往海洲的有屈仁则、高佬惠、梁自带、梁正、谢云龙、郭海泉、萧仇、萧天祥、梁华照、梁润带、黄祺仔等，林小亚、伍藩、方学昭等也来过，但不多。香港失陷后，大批的“高等”难民经此往内地。

我由罗定回海洲后，工作岗位早已由袁开、魏锦太、袁锦辉等和屈仁则商量好了，任海洲乡长。袁见成、袁毅文为副乡长，袁毅文兼海洲自卫队中队长。伪维持会则自乡长以下副乡长、文书、保长等全部保留下来，专门应付“日本仔”。谢云龙部下莫予京中队常驻在此，下辖两个小队。一个小队由他掌握，一个由海洲公家枪支所装备，由屈仁则派来的杨明为小队长。莫予京和杨明以战胜者的姿态雄踞在此，霸道之极。海洲乡公所除了执行日常工作外，还做了民利公司及由港澳逃难到内地的招待所。

乡公所经费来源是通过上层人物的会议开设赌博（海洲历来都是这样，开会只是使他合法化，使其他流氓不得开设与乡公所争利）而来。因为走私的人多，“大天二”来往多，赌博很盛，筹得的款项颇为可观。经费的支出：莫予京占了3成，医药、建造另计，其余还有杨明小队、伪维持会人员的薪水和办公经费及招待敌伪费，我所主持的乡公所经费及海洲学校的全部经费。我和袁见成、袁毅文的薪水起初是现款支付的，每月大概300斤米，后来由乡民定了500斤。

到海洲的“大天二”大概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来开会，都是支队级以上，这和我的关系很少；一种是路过此地歇歇脚；一种是原驻地站不住

<sup>①</sup> 屈仁则为“挺三”副司令。

<sup>②</sup> “大天二”是当时盘踞在中山沙田及民田区一带，从事走私、开烟赌馆、勒收田赋等勾当的封建式地主武装。

脚，到海洲来躲一躲。后两种来到后，一是找各支队在此居住的人，一是找和他们有生意关系的人，一是来找我。这些都是大队级以下的队长，每次见面，不是去喝茶，便是去茶楼吃饭。晚上则成堆聚在床上抽鸦片烟，有时则在茶楼叫个女职工回来谈天说地，松骨、打烟荷。这差不多是习以为常的节目，一连几年，都是这样。我万分警惕地克制自己，不致染上烟瘾，也不敢和女职工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他们一掷千金地打麻将赌番摊，使人震惊。这方面，我从不尝试。

方学昭做中山县长时，梁自带介绍我做区长，一来我要求去五区（因为五区接近五桂山，很想和五桂山发生联系），二来方学昭的女婿暗示索要 20 万茶资。我认为卖官鬻爵是可耻的，而且我也没有那样多的款项，即使借得到，但必须向人民抽剥来还，这是我所不愿做的，就将这事丢下了。梁自带这样地关照我，大概是他和他的队伍经过海洲时，得到许多方便，其次是他对袁带不满，知道我对三区的统治者不满，要培植我作为他自己的力量。然而，我很希望进步与得到进步力量的鼓舞。

### 白皮红心 曲线抗日

在罗定回来不久，我就设法从五区寻找过去的“抗先”队员到学校做教师，找到了郑刚拔<sup>①</sup>等人。将小学毕业的学生再加以一年的新思想的训练，一连训练了两年。1941 年冬至 1942 年春，“挺三”的中尉附员赖伟良组织敌后抗日锄奸队，对付汉奸和密侦，约我开筹备会。赖伟良和容忍之熟悉，也约了容忍之，在筹备会中我和容忍之更加熟悉了。赖伟



中共地下党在海洲袁世根居所秘密印发一系列抗日宣传教材（引自《中山市小榄镇志》上册）。

① 郑刚拔，中山三乡人，中共党员，后叛变，新中国成立后被枪决。

良的意图是叫我们帮钱帮枪，发展个人力量。我们没有上当，开过一次筹备会，就没有了下文。但之后我和容忍之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他对于形势的分析，使我非常佩服。再以后通过容忍之的关系，我和鹤山的李学昭、杨基及陈克、容国瑞等都很熟悉。大家时常集中在我家中，曾经假借屈仁则的名义办过一份《持正报》。

1942年，伪币币值日低，米价日高，荷塘、小榄、潮莲的破落地主大批地将在海洲的耕地出售。海洲人走私及经商营利的或经营糖厂赚了钱的，大量购入土地（估计海洲有10000亩土地面积，过去有十分之八是外乡地主收租的，到抗战结束时，海洲人买回的有50—60%，剩下的只有二成左右）。新买地的地主都嫌租金低，自耕比收租还有利可图。因此，他们一买了土地，不论批期满与不满，都向耕人取回自耕或者另外批发。这种情形在1940年已经很普遍，伪维持会不加理睬。因此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有的全部失去，有的部分失去，许多人因此饿死。1941、1942年夺佃之风更加严重。我不顾地主不满，订下规则，贴出布告，坚决制止中途夺佃，业权即使转移了，农人一定要照批约年限种满，并且规定租金不许增加。首先将海洲能起决定作用的最大地主，如恒敬堂公尝田，及圣母庙的庙尝田，用行政命令强迫其遵守。其余的地主不敢不从。次年又说服屈仁则将此办法通过全区的乡长会议作出保证佃权的决议，由伪区公所的名义使这个办法合法化，并且印出了办法让大家遵守。同时，在乡公所的经费项目里拨出款项购买早熟作物种子发给农民，提倡种植早熟作物（有一年买了三四百斤粟米），在灾荒严重时期要大户捐款赈济（有一年赈济了四五十天），同时说服糖厂收容灾荒儿童（惠农公司收容约50多名，鸿发公司收容约40名，一直养到抗战结束）。这种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饿死及逃亡的人数比邻乡少许多。

由于“大天二”力量控制较紧，中山三区除盗窃之风很兴盛外，土匪的活动很少。荷塘、江尾等地则很厉害，来往客商，由一条乡过另一条乡，都被劫去了，有的还被打死。大约1942年，屈仁则叫我组织中、顺、新附近江尾、荷塘、海洲各地的联防办事处，让我当正主任，荷塘的李子瑜、江尾的欧阳培做副主任。不久，袁带叫我去八区做区长。我和容忍之同志商量。他认为去八区没有用处，搞好中、顺、新同时树立一个抗日的

地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益处。我照容忍之的意见，尽力搞联防筹备处，召开过几次筹备会。后来，不知什么缘故，“挺三”将联防筹备处撤销了，另外委派欧阳培为江尾大队长，直属“挺三”司令部。

荷塘的土匪很猖狂。来往鹤山的商民经常被抢劫，而且还有大规模组织，以荷塘为基地扩大活动的计划。容忍之和我商量，请海洲的自卫队过荷塘将那股土匪消灭。通过争取屈仁则的同意，我和容忍之等作了很久的部署，最终解决了大部分土匪，并且建立了荷塘的自卫力量。

对于莫予京的事事干涉，以及屈仁则、谢云龙等对抗日有直接贡献的工作都不给我做，我很是不满。因此不管屈、谢意见怎样，我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自己直接行动。江门北街附近，有一条乡叫潮莲，因为接近江门，敌伪势力很大。江门的密侦队有一组人在潮莲，负责人为陈成、陈章、陈华三兄弟。他们凭借江门密侦队长李兆的力量，横行霸道，无所不为，全村都受他们控制。潮莲的朋友时时来申诉，要求我们为潮莲人解除痛苦。我和容忍之研究，如果消灭了潮莲密侦，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经常袭击北街的敌人。于是我将海洲自卫队和荷塘一小部分自卫队配合起来越过潮莲，将陈成、陈章打死。陈华没死，在江门扬言报仇。我们用6万元的代价花了几个月的功夫将陈华击毙在江门的俱乐部。

江门—澳门线的商船，负责拖带的电船，有几个日本仔护航，有轻机枪装备。我们和那只船的司机约好了，在古镇外海的河面伏击。伏击了两三次，没有成功，却给谢云龙发觉了。他大闹不止，说以后如果我越界搞事，一定作土匪对待。

我们凭借赵养的报告，动用了许多款项，出了许多办法，从澳门骑夺一只专门走钨<sup>①</sup>供给敌伪的电船回来，一直驶到海洲的沙面，将走钨的人袁远扣起，将电船留来自己使用。这样，屈、谢都说我胡作非为，连住在海洲的张惠长都认为我们惹是生非，会连累海洲（其实是怕他自己在海洲居住不安全）。但不管怎样，我们却不声不响地将袁远和几个同船的扣留一年之久，直到胜利后几天，才将他们释放。

由于在潮莲干了影响较大的事，以及在古镇伏击电船和在澳门骑夺走

① 即走私钨矿石。——原注

鸨电船的事，谢云龙认为我很不驯服，野心很大，而且当时海洲有7间糖厂，每年糖捐<sup>①</sup>大概有150万斤米至200万斤米之间，谢云龙和莫予京屡想染指。有一年，莫予京出面承办。我想如果由他承办，蔗价会跌得更低，农民生活会更加痛苦，煮糖工业就要大受打击。同时我对他们挂抗日的招牌做幌子，为个人私利明目张胆，勾结敌伪，包收糖捐的害国害民行为，很是愤恨。于是我和经营糖业的人商量，坚决拒绝，并通过合理合法，以抗日人员不许为敌伪承办捐税为由给予严重的打击。第一年他们没有成功，第二年又由伪区长黎湛泉出面承办（谢与黎是互相勾结的，可能得到谢的默许），派了10多个人来准备开收，我们同样坚决拒绝。黎湛泉派了一个伪区员见我，说如果收成，可将收得的四分之一送给我，由我处置。任他怎样威迫利诱，我坚决不依，派来的人只好讪讪而走。莫予京对我的义正辞严也无可奈何。什么民利票、禾票（每亩要三四十斤）我都借口海洲人不习惯交纳，拒绝缴交，一连4年，都是如此。因此，谢云龙愈来愈对我不满，特别是五桂山区部队经海洲入粤中，以及梁伯雄部队被害以后，海洲人参加梁伯雄（部队）的多数是经过我们所办的训练班学习过的。许多人说是我介绍的。那些被捉的人又由我保释，不是海洲的也说了袒护的话。因此，袁带和屈仁则等对我有更多疑虑。有一次，屈仁则叫我到张惠长住的地方：“你识五桂山区的什么人？”在毫无头绪中，他让我叫青年们不要“乱搞了”。有一次，他将他的部下黄壬枪决，叫我到小榄对我说：“黄壬已经枪决了，以后做事要小心。”新中国成立前任伪广州市参议会的参议员袁良驊，那时经常来往小榄、海洲，和我们称兄道弟，和袁带也很熟。有一次，他在烟床上对我说：“袁带说过必要时不管兄弟与否，都要杀你，要小心小心。”梁自带也对我说过这一类的话，我以后就更加警惕。这是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事。

### 经受考验 光荣入党

1944年秋，容忍之叫我参加共产党。这本来是1938年起就有的朦胧希望，六七年来跑过了内地亲身体会到内地的一塌糊涂，千辛万苦地由内

<sup>①</sup> 即赋税。——原注

地转回沦陷区，希望直接参加抗日，而统治者对于真心希望抗日的不给你去抗，挂了抗日招牌的却勇于走私、收田赋，勇于组织游伪大会围剿山区、中区的革命队伍，勇于游伪一体包收伪捐税，而怯于抗日。特别是1944年国民党军在西南一线，一两个月内，一败千里，而八路军则不屈不挠地坚持敌后战争，给敌人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一有机会，我就不管袁、屈等怎样的加害进步人士，怎样对我怀疑，坚决地兴奋地接受了容忍之的意见。在1944年冬季，由容忍之和关立两位同志介绍，和容国瑞两人一起加入了党组织。

【延伸阅读】

## 中山的“白皮红心”政权

1940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作国民党区公务人员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认真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层各级行政机构公务员地位。中山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实际，利用一切条件，派员打进国民党地方政权内部工作，以合法身份掌握敌情，保护组织和同志的安全，掩护革命活动，维护群众利益。

除袁世根任海洲乡长，将海洲建设成为中山地方党组织一个可靠的活动据点外，其余“白皮红心”政权情况有：

邻近县城石岐的张溪村，是城郊水路交通的要隘。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计划将其发展成为自己的基地，派党员黄峰回乡秘密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党组织。黄峰回乡后，先后秘密发展了爱国青年杜广（原名杜宽活）、梁沛洪、马锐彬、梁达初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8年冬建立了中共张溪支部。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该支部从未间断过活动，中共中山县委也于1939年初搬到张溪乡。1943年11月，黄峰当选为张溪乡乡长，中共珠江特委书记梁嘉特别指示让黄峰当好“白皮红心”乡长。黄峰上任后，安插了一批党员担任乡中职务。黄旭主管武装，梁哲主管交通情报，

梁湘到张溪学校当老师，杜广打入张溪乡警队掌握武装。

沙栏梁颢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县抗先队派驻沙栏的郑涯舟（中共党员）依靠他在沙栏设立蒙馆掩护开展工作，使之成为党组织一个可靠的活动点。陈翔南兼任三九区区委书记时，有较长一段时间驻九区，落脚点常在沙栏梁颢家，为了安全起见，还办起了陈翔南咸鱼公司以作掩护。1940年夏，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和委员陈翔南到中山检查工作并召集中山县委成员在本部开会，恰遇日军大举入侵，中山局势动荡，会议随即转移到九区继续。九区区委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地点就选在乌沙沙栏。

在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罗若愚，于抗战初期恢复组织关系后，在黄圃石军建立了党的活动点和秘密交通站，使石军乡政权为中共地方组织所掌握。1940年夏，中共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谭本基到中山九区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发展地方党组织，以配合这个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领导发动当地教师开办夜校，向群众宣传抗日。罗若愚以石军乡乡长的公开身份，掩护谭住在自己家。1941年春，地方党组织和中山抗日游击大队积极支持和发动九区农民开展反“霸耕”和反“伪票”斗争，取得胜利。同年秋，南番中顺中心县委作出“发展中山”的决定，委派欧初带领第一中队驻扎在石军沙。为配合部队开展工作，中心县委调派了一批中共女党员到石军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并很快打开局面，成功争取了群众对部队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大力支持。1941年冬，第一中队从石军出发，远道奔袭出击神涌、崖口等伪军，石军党支部动员村民出动农艇运载部队。

湖洲乡的乡长肖日新倾向抗日，热心支持游击队。抗日游击队从二区到五桂山，必在湖洲休整，有这位“白皮红心”乡长掩护，均安然无恙。

这批建立在敌人心脏的“白皮红心”政权，为掩护中共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战期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整理自《中国共产党中山地方史》（第一卷），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